

K203/103

中 华 名 匾

主 编 林 声

副主编 袁闾琨

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

0000002147

374825

装点名胜颂江山

——《中华名匾》序

匾额，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。其语言简练，寓意深长，文采激扬，趣意盎然，是绽开在中国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，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。

在中华大地上，大凡有文物古迹、风景名胜之处，多有名匾依存。它们与名山胜景相辅相成，倍增景色。这些文物古迹，风景名胜也正是由于有了大学者、大文豪、大书法家举笔挥毫，题写标名，才相得益彰，名驰天下。甚至有些本来不出名的地方，因为有了有名的匾额而使之驰名起来，成为人们向往的胜地。

名匾，具有历史价值、学术价值、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。它向人们显示了历代文风、时政、地理、历史以及文字和书法艺术的变迁，成为今天我们研究民族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。

我国匾额的历史悠久，内容丰富，数量众多。在历史文献上，有扁、额、牌、榜等单称；又有扁额、扁榜、牌额、牌扁等合称。

据《说文解字》说：

“扁，署也，从户册。户册者，署门户之文也。”

扁字也作匾、曄等字。

额，《说文解字》作额字。也即是悬于门屏上的牌扁。

历史上关于书写匾额的记载,传说故事非常之多。如南宋羊欣《笔阵图》上记载:“前汉萧何善篆籀,为前殿成,覃思三月,以题其额。”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,萧相国为给长安未央宫前殿题匾额,苦思了三个月,足以见其认真之态度。宋朝岳珂《桢史》上记载:“初,吴山有伍员祠,瞰阊阖,都人敬事之,有富民捐资为扁额,金碧甚侈。”足见当时即便在民间,对匾额的重视已达到相当的程度。宋朝杨万里的《诚斋记》上还记载了大书法家米芾为《真州重建壮观亭记》并大书其匾的事。明朝成化进士萧显为山海关城楼书写了“天下第一关”的匾额,引出了一场曲折的戏曲故事。至于为题匾题额、书牌书榜而进行推敲、挥毫的风流韵事,传奇佳话更是不乏其记载。

随着历史变迁,匾额逐渐与对联相结合,成了对联的画龙点睛之笔,称之为“联额”或“对额”、“横批”等。凡书写对联者对这点睛之笔都非常重视。在《红楼梦》第十七回中的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”一段,写贾宝玉随贾政等人游大观园时,他们先后为桥上之亭题了四套对额。有人提议从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中的“有亭翼然”而取“翼然”;贾政则主张从“泻于两峰之间”而取“泻”字;而又有人则认为“泻玉”二字妙。宝玉听后道:“用‘泻玉’二字则不若‘沁芳’二字,岂不新雅?”最后用“沁芳”题了匾额。宝玉四周一望,计上心来,又配了一副对联:

绕堤柳借三篙翠,

隔岸花分一脉香。

曹雪芹为“沁芳”的对额如此不惜笔墨,写了老长一段文字,可见匾额是很难作的。不仅不俗不僻,切情切景,而且要文字精采,寓意深长。

匾额的形式是非常丰富多采的。就其基本形式来说,可分为竖匾和横匾两种。早期的匾额以竖匾为多,多为长方形,也有近于长方形和方形的。晚期的匾额为横式,基本上是横长方形。为什么出现由竖额转变为横额,这要从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变化谈起。中国古代建筑中有一个十分明显而突出的结构特征——斗拱。斗拱位于房檐之下,它撑托着房檐,使之高大深远。在唐宋以前,斗拱这一部分结构非常雄大,它在整个建筑物的高度中所占的比例很大,相当于房檐柱子的三、四分之一左右,或更多一些。自元、明、清以后,斗拱这一部分结构比例就逐渐缩小,只相当于房檐柱子的五、六分之一或八、九分之一了。就是说柱顶到房檐之间的高度越来越减少。匾、额、牌、榜大都是悬挂在建筑物房檐之下的,在原来比较高的房檐这一部分,悬挂竖匾、竖牌当然比较合适,而到后期房檐之下高度减少之后,横匾就合适了。尤其到了后期,明、清时期匾额的文字也较多,竖匾就更不合适了。当然后期也不都是横匾,

有些高大建筑，檐下亦甚宽大，也用了竖匾，如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和大型寺庙等等。汉唐时期也不都是竖匾，也要看建筑物的具体情况而定。

现存建筑物上的匾额，除了汉、晋南北朝的华表、石阙上有类似额题之外，木结构建筑物上的匾额在我国首推天津独乐寺的观音阁。其匾名曰“观音之阁”，下署“太白”二字。有人曾经考证为唐代李白所书。但此阁为辽代统和二年（984年）所建，应是与阁同时所立。此外，在观音阁之前当有南禅寺与佛光寺二处唐代建筑，但其匾额已为后代重换，非为原物了。由于我国建筑文化曾远传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国，匾额文化也同时传去，因而这些国家也保存了不少著名的匾额。如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一块“唐招提寺”匾额，经过一千多年仍保存了下来，甚为珍贵。

自隋唐以后，宋、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历代保存下来的匾额为数非常之多，明清匾额数以万计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。

关于匾额的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，越来越丰富。秦汉匾额，因无实物留存难以考定，但从唐宋匾额形式中可推知其一二。宋李明仲《营造法式》中所列举的两种匾额的形式与“唐招提寺”、“独乐寺”、“观音之阁”匾额，相去不远。如其中的殿阁门亭等牌第三的“华带牌”与观音之阁和其他许多寺庙的匾基本相同。还有一种叫“风字牌（匾）”的，也基本相同。这种牌匾的做法，在《营造法式》中也有详细的说明，现摘引部分如下：

“造殿堂楼阁门亭等牌（扁）之制，长二尺至八尺。其牌首（牌上横出者）、牌带（牌两旁下垂者）、牌舌（牌面下两带之内横施者）……牌面每长一尺，则广八寸，其下又加一分。”

“凡牌面之后，四周皆用幅，其身内七尺以上者用三幅，四尺以上者用二幅，三尺以上者用一幅，其幅之广厚，皆量其所为之。”

以上《营造法式》之规定与现存实物相对照，也都相似。

到了明清时期，匾额的形式又进一步发展，式样翻新，如有各种册页匾、书卷匾、画卷匾、秋叶匾、碑文匾、虚白匾……等；有许多匾额的周边边框（即《营造法式》所称之牌首、牌带、牌舌部位）上，雕饰各种龙凤、花卉、图案花纹。有的还镶嵌珠玉，极尽华丽之能事。清代匾额往往用汉、满、蒙、藏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同时书刻。其形式与内容更加丰富了。

自有匾额以来，它就与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密不可分，与建筑、书法、民俗、文学、艺术相结合，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其写景状物、言衷抒情、音流弦外。悬于宅门则端庄典雅，挂在厅堂则使

蓬荜生辉，装点江山名胜则古色古香，江山增色。虽片辞数语着墨不多，望之却巍然大观，叙事绘景，写意抒情，寓意深邃，具有极大的文学艺术感染力。

今举几处匾额较为重要而又集中之地，以窥其一斑。

山西应县木塔，是我国现存唯一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塔，建于辽清宁二年（1056年），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。塔高67米余，为现在世界上最高的木构建筑。如此高大雄伟、结构精巧之木构，何以名之、状之、赞之，历史上骚人墨客、书家、学者、艺术大师们，利用匾牌这一艺术形式，发挥了极其高妙的作用。现在塔上的层层匾额，把古塔辉映得更加辉煌绚丽。不仅匾额的文辞精练，寓意贴切，而且书法遒劲，气势轩昂，为文学、书法之瑰宝。现在木塔内外的数十块牌匾不仅具有文学书法上的价值，而且也是木塔修缮历史和重要活动的珍贵史料。如悬在第五层南面外檐的一块“峻极神功”的匾额，是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四年（1406年）北征时亲笔题写的，这四个字不仅高度评赏了这一木构杰作，而且也是这一重大政治军事活动的记录。第四层南面明武宗朱厚照于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来此进行登塔宴赏活动所题“天下奇观”四字的匾额，也是对这一杰构的高度评价。其他如“万古观瞻”、“天柱地轴”、“天宫高耸”等匾额，莫不十分贴切而又生动描绘出这一绝构的雄姿。尤其是正面第三层的主匾“释迦塔”匾额，字体雄浑，体形硕壮，其形成与宋《营造法式》所列举的“华带”牌匾非常一致。最为珍贵的是这块匾上还记录了金明昌六年（1195年）和元延祐七年（1320年）两次对木塔和寺院进行修缮的题记，是此塔早期维修的记载。塔上与匾额相配合的还有许多对联，如第二层南面的一副对联：

拔地擎天四面云山拱一柱；

乘风步月万家烟火接云霄。

第三层南门外的一副对联：

俯瞩桑干滚滚波涛紫似带；

遥指恒岳苍苍岫嵒屹如屏。

写景抒情都很高妙。像应县木塔这样的重要古建筑身上的匾还有很多很多。

被称为帝王夏宫的北京颐和园，是匾额非常集中的地方，其数量之多，在全国范围内恐怕是名列第一的。据初步估计，全园建筑的匾额恐怕要达数千之多。就拿长廊一处的匾额来说，就有数十块。廊子的两头进出口均有匾额，廊子中间的四个亭子，每个都有几块匾额。四个亭子的正名匾额，是按春夏秋冬四季并结合湖光山色和周围环境而题写的，所题“留佳”、“寄澜”、“秋水”、“清遥”四匾，也

即是四亭之名，情景都非常贴切。亭的匾额也都题得富有诗情画意。如“烟霞天成”、“文思光被”等等。在长廊西头以短廊连接的一座三层楼阁上的一块匾额名曰“山色湖光共一楼”。如果我们登楼一览，万寿山的秀色和昆明湖的波光尽收眼底，不能不使人感到这块匾额题得是非常恰当的。排云殿和它前面牌楼上的“云辉玉宇”匾额，万寿山东头前山与后山分界处的城关式建筑上的“赤城霞起”、“紫气东来”匾额，西堤六桥上的玉带桥、界湖桥、鬲风桥、镜桥、练桥、柳桥等匾额，谐趣园和园中的亭、廊、殿、桥的匾额，无不是千锤百炼、反复推敲而写成的。我们走进园中，举目眺望，一亭一殿，一廊一榭，一桥一坊，一楼一阁都有匾额向我们指示行径，说明所在。这些匾额如园中颗颗珠玑，与园林建筑、湖光山色交相辉映。在全国各地的园林中有大量匾额存在。如北京的北海、中南海、玉泉山、香山、恭王府、承德避暑山庄，苏州拙政园、留园、网师园，扬州个园、何园，杭州西湖等等，匾额甚多，内容丰富，不及一一列举。

泰山，为五岳之首，又是著名风景胜地。历代帝王来此封禅、祭祀，骚人墨客、学者名流来此游览甚多，留下了许多匾额牌匾珍品。从山下的岱庙、遥参亭沿着登山道路至碧霞祠、玉皇顶，在庙之内、山路之峰、山道两旁布满匾额值得注意。它们并非单独制作的悬挂牌匾，而是直接于建筑物或碑石上之额。其一是坊额，其二是碑额。坊额是刻于牌坊上者，按牌坊来说，于汉唐时期我国城市中的坊里制度，在坊门上书写坊里名称之额。也即是匾额源流之一种。泰山之牌坊甚多，在登山正路上标志登山行程和位置的有遥参坊、岱宗坊等无数的匾额珍宝，标志出建筑物的名称内涵，指示着登山行程或其有特殊意义的含义。这里除了殿阁亭台等建筑物上匾额外，有两种形式的“一天门”、“二天门”、“中天门”等，每一个坊都标示出登山所在的位置和行程之约计。如行至中天门石坊时，便可得知已至行程之半，且此处亦为停歇观赏之佳处。在此路上，尚有特殊之石坊，坊上题额记载了历史上在此发生的事件值得一书的。如一天门红门宫前一明代石坊上题“孔子登临处”坊额，乃为后人怀念孔子登泰山而作。在中天门北有“五大夫松”石坊额，乃后人为记叙秦始皇登泰山在此遇雨避于树下，封为五大夫之故事而题，如此等等。

碑额是标冠碑刻之名，概括碑文内容的画龙点睛之笔，书法艺术价值甚高，往往以篆籀、隶楷大字为之，泰山岱庙内之秦汉晋唐宋元明清历代碑刻甚多，不少碑刻之碑头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。刻于泰山之碑，当首推岱顶大观峰之《纪泰山铭》巨碑。碑为唐开元十四年（726年）唐玄宗李隆基封泰山时所书。碑高13.3米，996字，被称为“自汉唐以来碑碣之雄壮未有及者”。其碑文书法开“唐隶”

之一格。其碑额“纪泰山铭”四字雄浑古朴，冠带全碑，而被后人加刻了“天下大观”四字于其上，虽云称颂，实则有损原貌也。坊表和碑首之匾额，在我国匾额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，故在此加赘数言。

以上所举应县木塔、颐和园、泰山三处，虽说是匾额较为集中处，各有其特点，但也仅是中华匾额群星中之数颗。其它各地各种类型的匾额汇集之处，数不胜数。如北京之故宫，山东曲阜之孔庙、孔府、孔林，全国各地之祠堂、寺观、名山胜景等地点，所在皆是，无法一一例举。

匾额，由于它是集语言、书法、字印、建筑、雕塑于一体的综合艺术，因而有着丰富的内容，一块好的匾额，既要有较强的思想性，又要有感人的艺术性。好的内容可以引发人们进行哲理性的思考和丰富的联想；优美的形式可以使人得到艺术的享受。许多名匾都可以讲出很多妙趣横生的故事来。如北京颐和园中谐趣园内一块“知鱼桥”的坊额和无锡惠山园中一块“知鱼槛”的匾额，就包涵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哲学故事。它们都出自《庄子》的濠梁问答（濠上）：庄子与惠子游于濠上，庄子曰：“倏鱼出游从容，是鱼之乐也。”惠子曰：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庄子曰：“子非我，安知我之不知鱼之乐？”匾额既是骚人墨客益智的领域，也是广大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，它虽是阳春白雪，但也能雅俗共赏。

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，又是文物古迹保存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。匾额遍布神州大地，浩若烟海。要将所有的匾额全部收集起来，实是一件难事，全部出版更加困难。如今编委会的同志们经过艰苦努力，将其中的精华部分收集起来，编成了《中华名匾》一书出版，填补了“匾额文化”这一空白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，保护祖国文化遗产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开展对外文化交流，均是一件有益之事，功莫大焉！值得赞扬，值得推荐，值得祝贺！至于具体的匾额内容与书法艺术、雕刻艺术、制作技艺等等，还是请读者从书中去观览到现场去欣赏吧！

高 占 祥

1989年12月8日 于北京

彩 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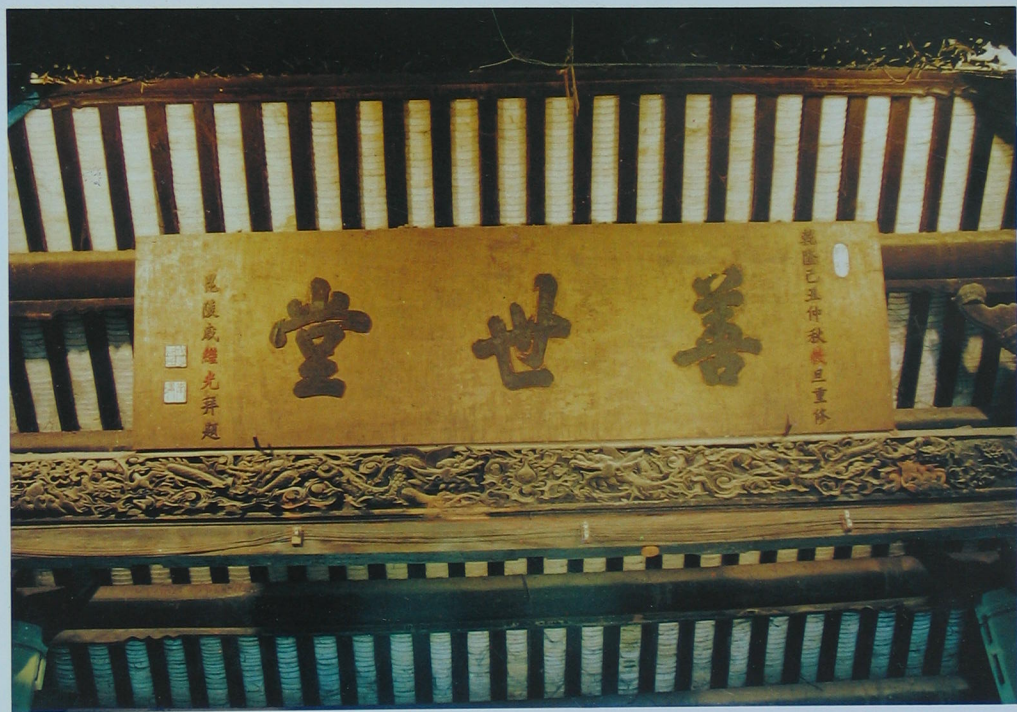
正氣 宋·朱熹書（羅岩提供）



岳麓书院 宋真宗赵恒书（于海寰摄）



第一山 宋·米芾书 （李大斌摄）



善世堂 明·戚继光书 （蔡德銓·苏卓尧摄）



母节子孝 明·祝枝山书 （黄红亮摄）



天宁古刹 明·海瑞书 （何平养摄）



充塞天地 明·张瑞图书 (罗岩提供)



天下第一关 明·萧显书 (于海寰摄)



豫園 明·王穉登書 (譚玉峰攝)



山西应县木塔 (袁阔琨摄)



观音之阁 (张一苓摄)